一、从三二〇事件到四一二政变
中共中央的决策及经验教训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从三二〇事件开始，中共中央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一再退让，使蒋介石逐步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结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阀的资助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使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中共中央在这一历史阶段决策方面的经验教训极为深刻，很有必要加以认真总结。

（一）对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阴谋活动一味退让、妥协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左派取得很大胜利。会议代表22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68人，中派65人，右派仅占45人。共产党员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实际上主持会议。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1000余名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除第五军外，其余各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是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大大加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约 10 余万，农会会员约 60 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 2000 余人，农民自卫军 3 万余人。

一身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大要职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汪精卫，这时表现得非常左倾。据张国焘回忆：他“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①。国民党二大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还没看完，就说内容很好，可作为大会宣言的资料。会议期间，汪精卫多次强调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在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生存下去②。在选举中央委员前，他预拟了一份名单和中共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③。1926 年 2 月 1 日，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议上，提议任命共产党员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④。5 日，又提议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⑤。2 月 22 日，他在纪念苏俄红军成立 8 周年联欢会上，发表演说称：“吾人对于如师如友而助我的俄同志，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情，惟有镌之心中而已”⑥。对于共产党员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暗中操纵的新右派群众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他也鲜明地左袒。3 月初，他召集两会会员训话，激烈地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称：“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⑦

①《张国焘回忆录》第 2 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479 页。
②《张国焘回忆录》第 2 册，第 479 页。
③《张国焘回忆录》第 2 册，第 482 页。
④《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64—465 页。
⑤《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 471 页。
⑥《广州国民日报》，1926 年 2 月 24 日。
⑦转引自蒋介石：《复汪精卫书》。

由于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并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方针，特别是由于苏俄在军事上、财政上大力援助广东国民政府，苏俄顾问团这一时期的地位和影响也明显加强。国民党的工作计划、章程等均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制订。他们提出的建议，基本上都被国民政府接受和实行。苏俄顾问控制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部门，成为这些部门事实上的头头，只不过在职务上被称为这些部门首领的顾问。1925 年 12 月末，有的顾问甚至占有海军局长（斯米诺夫）和空军局长（列米）的官方位置。

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又称："军政大权已完全在俄人掌握之中。"

新右派头子蒋介石，通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掌握了广东的主要军事力量。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他"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①]。他企图通过即将到来的北伐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他把正在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做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为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他同汪精卫的矛盾也突出起来。

1926 年 2 月 26 日，蒋介石突然扣留亲近汪精卫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二天将他押送出境，改派自己的亲信刘峙担任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师长，消除了后顾之忧。

3 月 18 日，黄埔军校驻省（指广州）办事处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调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4—115 页。

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蒋介石的党羽诬称共产党阴谋暴动，要炮轰黄埔，劫持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3月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擅自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对汪精卫的住宅也以“保护”名义包围。广州陷于一片紧张恐怖之中。这就是所谓中山舰事件，亦称三二〇事件。

当时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广东有很大力量，这次行动带有试探的性质。他制造事端后，很快又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由于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因此，“自请从严处分”。

事变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同苏联顾问团商议对策，主张给蒋介石以回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执委和中监委秘密撤离广州，到叶挺独立团的驻地肇庆、高要一带去；然后开会通电声讨蒋介石，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①] 但是，苏联顾问季山嘉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不赞成反击。尤其是当时在广州访问的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联视察团团长布勃诺夫害怕反击会影响中苏关系，并认为顾问团自身的工作有严重缺点，也主张对蒋介石让步。他们在得到蒋介石“对人不对俄”的回答后，表示如此即可安心，并答应让季山嘉等人回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这个突然事变既缺乏精神准备，也缺乏应付的经验。开始中共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认为事变同广州同志工作上的错误有关，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没有退让’”[②]。认为蒋介石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有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

① 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② 李立三：《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1930年1月。

伐。中央派张国焘为代表到广州执行这一妥协政策。张国焘在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上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①。

张国焘在同蒋介石谈判时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特地来看望蒋的，中共始终支持蒋，并“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②；同时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也没有接受他们的这一主张。

汪精卫当时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但在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淫威之下感到孤立，一筹莫展，称病离职去欧洲。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汪精卫“病假”期间由谭延闿任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由于中共中央在处理三二〇事件上的妥协退让，使蒋介石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通过这一事件，蒋介石摸清了共产党人的弱点，使他有恃无恐地加紧反共活动。这一事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接着，蒋介石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4月6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准备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苏联代表、国民政府首席顾问鲍罗廷在北京，他回到广州后，在同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时，为了贯彻共产国际提出的要求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并促使蒋介石北伐的方针，对蒋介石作出让步，同意他提出的“整理党务”的8条。

①《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505页。
②《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506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样，也决定对蒋介石的要求采取妥协态度。他们派张国焘到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党团内部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意见不一致，讨论 7 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①]。这样，在 1926 年 5 月 15 日至 25 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

《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 1/3 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

蒋介石的反动提案被通过后，中共中央决定逆来顺受，6 月 4 日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除重申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外，着重表示：“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②]似乎《整理党务案》与中共毫无关系。殊不知，当时的国民党系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而非纯粹的一个政党，因此，整理党务必然事关两党。

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使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大权。《整理党务案》通过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包括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全部离职，换上国民党右派分子。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3 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2 页。

（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中的右倾投降主义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仍然留在远离革命中心地区的上海。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以至一步步滑向右倾投降主义。

还在北伐出师前，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曾请周恩来询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让张国焘主持开会讨论，但开会时并没有真正讨论，只由张国焘说了一句话："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很长时间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使他的实力在北伐中极大地膨胀起来。

蒋介石专横跋扈，凭借夺取的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指使许多地方的反动派打击工农群众运动。他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也引起国民党左派、国民革命军中一些将领和黄埔军校师生的不满。当时还在欧洲的汪精卫仍被看做国民党左派领袖，因此，从 1926 年 7 月起，国民党一些省市党部纷纷电请"汪精卫销假视事"。9 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党权高于一切"，"提倡党内民主，反对独裁"的口号。10 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上，通过几个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议案。反对蒋介石独裁，"迎汪复职"的呼声越来越浓厚。

蒋介石对于"迎汪复职"的呼声惶恐不安，担心汪精卫回国削弱自己的地位。但他感到处境不利，不得不在表面上拥护"迎汪"，同时派代表找中共中央寻求支持，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这显然是反击蒋介石，夺回被他篡夺的那部分权力的大好时机，然而，中共中央却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针。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作用估计过高，害怕失去他会使北伐阵线崩溃。同时，对汪精卫寄予很大期望，希望汪精卫回国，使国民党左派有坚强的中心，让汪精卫担任国民党领袖和政府首脑，蒋介石任军事首领，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因此，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尽管蒋介石独裁的局面十分不利于国民党的发展，“然而在反对广东内外反革命势力之斗争里，我们还是要赞助他；我们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为赞助他的根本条件。我们极力促成迎汪复职的运动，但决不是梦想回复 3 月 20 日前局面，决不是倒蒋。我们的口号是‘汪蒋合作’”[①]。根据这一方针，陈独秀向蒋介石派来的代表表示，中共只是在三个条件下赞成汪精卫回国，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首领地位；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②] 这个答复明确地表示了对蒋介石的支持。

由于中共中央的错误决策，使蒋介石逐步摆脱困境，有计划地加强右翼势力，加紧控制领导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

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同时，历史也给了共产党人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政权的机遇。

北伐军所到之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土崩瓦解，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发展，工会、农会普遍建立。随着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一些共产党员和工农代表参加到革命政权中去，如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林祖涵、李富春参加江西临时省政府。江西九江、永修等县的县长由共产党员担任。湖南省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或公法团联席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县农民协会、县工会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的代表，原有县长不能不听从各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345 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325—326 页

群众团体的意见，实际上形成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的形势。

对于北伐战争胜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新事物，中共中央由于错误的认识，因而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做法。一方面，当时党内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参加政府看成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中央甚至提出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前途缺乏正确的认识。中共四届三次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陈独秀的报告，把建设民族资本主义看成是中国革命最好的前途。不久，他又发表文章表白，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①。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中共中央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立场，连续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积极行动，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②。

在军队问题上，陈独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也同样采取消极的态度。1926年11月，陈独秀在《革命与武力》一文中，荒谬地提出现时中国“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现在“革命的民众不容易得着武装”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一再反对有能力的共产党员从事军事工作，反对已经从事工农运动的共产党员报考黄埔军校，规定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工作“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④。这样，在北伐战争中大量的由中共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机会，便轻易地丧失了。

1926年底，南方革命阵营的分裂已趋明朗化，蒋介石的反共

①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载《向导》周报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

②《中央复湘区信》，1926年10月7日。

③《向导》周报第179期，1926年11月25日。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55页。

面目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面对这样的严重局面，中共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在 1926 年 11 月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即指出：不能希望新军阀“能够长期与我们合作”，因此，我们应该准备力量，“强固民众的势力”，以便将来爆发大斗争时“我们才有胜利希望”①。12 月 11 日，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也明确指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② 他警告说，当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新右派有可能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危害革命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有所准备。但是，中共中央却认为这种主张是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③，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 1926 年 12 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在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中，竟然把民众运动的兴起看成是最危险的倾向之一，是造成统一战线破裂的最主要原因。会议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这种左右倾向倘若继续发展下去，必然距离日远会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危及整个国民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其主要的策略是“在中共党内要反对‘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看不起国民党’”“‘误解党的独立性’等所谓‘左稚病’”限制工农运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655—657 页。
②《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 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472—473 页。

动的发展，反对解决土地问题；把国民党的党权交给汪精卫，把军权继续让给蒋介石，把一部分民众运动的领导权也交给国民党。

这次会议制定的挽救危机的策略是错误的。这些策略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巩固并加强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而是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首领身上，一方面企图用妥协退让使蒋介石不再向右发展；另一方面又企图以扶助汪精卫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实质上就是要中国共产党交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向蒋介石妥协而惟汪精卫的马首是瞻。

这次会议打算用妥协退让办法防止资产阶级右倾，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为大革命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陈独秀的右倾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同意。在这条错误路线指引下，不但没有制止蒋介石所谓的‘ 右倾 ”,反而助长了他的反动气焰,加速了它公开背叛革命的进程，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三）四一二政变前夕，仍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

在陈独秀积极推行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却加紧了对革命的进攻。1926 年 9 月 4 日，英国军舰闯入广州珠江，英国水兵强行登陆，占领码头，收缴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9 月 5 日，英舰炮轰四川万县，炸死炸伤中国军民五六千人,制造了‘ 万县惨案 ”。1927 年初，当北伐军向长江中下游进军时，英、美、法、日等国纷纷调集军舰和增派军队来华。3 月 ，帝国主义列强停泊在中国水域的军舰已达 170 艘，集中在上海的近 60 艘，军队增加到近 4 万人。

在帝国主义准备直接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的情况下，蒋介石更加紧了他的反共行动。1927 年 1月，他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控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利用国民党省、县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的名义，派出大批走卒充当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处勾结土豪劣绅，组织假农会，摧残和镇压农民运动。3月1日,他指使驻军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7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命为革命的代表，宣称：“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他是反动派,当做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3月16日，他唆使爪牙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17日，又命令党徒捣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市总工会，打死职工4人，打伤多人；23日，又指使流氓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等团体。此外，在南京、杭州、福州、重庆等地也连续出现国民党右派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及群众团体，残酷屠杀革命群众的事件。

为了支持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促使他公开反共，3月24日，即北伐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遭到严重伤亡。这一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他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在取得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的支持后，蒋介石加快了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他把不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离，调集由他支配的部队驻扎在江浙两省和沪宁地区。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与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和国民党政客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刚从国外归来的汪精卫也参加了反共密谈，只是在分共的时机与方式上同他们有一些分歧。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也有过正确态度，1927年2月17日,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态度的决定，并指出：“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负起责任去冲锋，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前进。”3月12日,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又指出“:我

们处在这个右倾局面之下，必须拿出向右进攻的决心，无论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断送革命。”①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党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胜利成果。

但是，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介石破裂，中共中央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3 月 25 日，陈独秀提出，应尽可能同反动军队“避免冲突”②。3 月 28 日，陈独秀又提出“要缓和反蒋”③。

正是在这种尽量避免冲突的策略原则指导下，当武汉的中共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主张从武汉调第四军赶到南京，配合尚未开往江北的第六军、第二军，加强南京一带防务，以防备蒋介石在沪宁一带异动时，陈独秀却打电报给武汉表示反对。

也是在这种策略原则指导下，4 月 4 日，陈独秀同汪精卫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会谈一开始，汪精卫便质问道：“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使国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个不可解的纠纷，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④ 汪精卫又说：“外面传得十分厉害，你不必骗我。”陈独秀诚恳地说：“外面所传都是谣言，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决不会骗人。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致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⑤ 这样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双方都向对方作出承诺。陈独秀保证：国民党与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中共目前无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汪精卫则保证：国民党将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政策。4 月 5 日，陈独秀征得汪精卫同意，将会谈结果写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14 页。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 387 页。
③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 428 页。
④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 年 11 月 5 日）。
⑤上海《申报》，1927 年 4 月 5 日。

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言行，反而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宣言说：“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因此，国共两党党员“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宣言声称：“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①

汪陈宣言造成的缓和空气，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造成了严重后果。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

蒋介石做好准备后，4 月 12 日，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继上海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

上述历史清楚地说明，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把握革命大方向，掌握革命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而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第 594 页。

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①]，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

①《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08 页。

二、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的一场争论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也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1929年红四军七大前后四军党内发生的一场争论,就是围绕如何进行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展开的。经过这场争论，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得以深化，初步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怎样保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怎样建设一支革命军队，怎样开展革命斗争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实现了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重大突破。

（一）红四军的状况和争论的由来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始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奉中央命令改称此名，简称红四军），是1928年5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师后成立的。从红四军成立到红四军七大召开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井冈山斗争和进军赣南闽西两个阶段。

从1928年5月到1929年1月的8个月中，红四军转战在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成功地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的多次会剿，克服了敌人封锁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极度贫乏，保持了红军的基本队伍，建立了红色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坚持了井冈山红

旗不倒。在开展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同时，红四军领导人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认真总结经验，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并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边界党的现状出发，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

事实也确实是如此。由于党和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并长期在农村，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由于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也由于土地革命刚刚兴起，红军还在初创时期，红四军党内对革命怎样搞，党和军队怎样建设缺乏经验，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错误倾向，严重地障碍着红四军的发展。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在总的路线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认识和解决军内存在的问题上，认识则不尽一致。分歧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上。一是在根据地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中,形成了“以宁冈为大本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以此为坚实基础，波浪式地向前发展，逐步扩大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朱德等红四军的部分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缺乏认识，没有深刻理解毛泽东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大意义，因此不能有效地抵制中共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出击湘南的错误指示，造成了井冈山时期最惨痛的“八月失败”,使红四军和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朱德为此受到军代表大会的处分。但是他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二是在党和军队的建设上，毛泽东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极端民主化；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朱德等部分领导人则侧重军事工作，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党内军内存在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性和危害认识不足，采取宽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7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